

# 風災後的他鄉與故鄉： 屏東大學人社實踐計畫簡介

屏東大學HISP團隊

## 一、前言：變遷中的社會與屏大

2009年莫拉克風災重創南部地區，本計畫聚焦災後原住民部落的重建與發展，選定三個被遷移至平地永久屋園區安置的受災部落為研究場域：阿禮、吉露部落（魯凱族，遷至長治百合園區）以及來義部落（排灣族，部分遷至新埤新來義部落）。

對外界來說，風災已過十餘年，居民可以遠離不安定的山林水土，並且在社會大眾捐款、慈善組織興設、官方單位政策介入下，從此安居於平地新園區，應該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殊不知，這項風災後的強制遷村政策，其實是在極短期間內形成，既缺乏民主程序，也未考量原住民部落的社會與文化特性，行政標準與認定也不齊一，讓包括本計畫的三個場域在內諸多原住民部落，不僅被迫放棄命根所在離村離鄉，新居的永久屋園區之房屋數量與產權又缺乏仔細規劃，部落文化命脈之傳承也陷入徬徨不安的狀態。

屏東大學在2014年由原屏東教育大學以及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兩校合併，創校之後即希望對先前缺席的諸多在地議題有所承擔，回應南臺灣的諸多社會需求。除了自試辦期即積極投入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之外，本校亦鼓勵原住民研究各教師進行團隊整合，能針對風災過後的遷村原民部落之社會、文化、經濟與教育衝擊做出比較有系統的研究與介入。因此，屏大於2020年末由相關教師組成團隊進行討論，於2021年投入國科會（時科技部）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第五期徵案。計畫團隊幸運地一路通過初審、場域審以及決審，於2022年7月1日正式成為國科會歷史悠久的人社實踐計畫團隊的一員。

## 二、在「永久屋裡想家」的部落：阿禮、吉露、來義

本研究對應的三個場域，各自受到風災不同的影響，也經歷了不同的遷村過程。簡述如下：

### 1. 阿禮 / Adiri

阿禮部落位於海拔 1200-1300 公尺，臺 24 線最末端之處，也是前往魯凱族聖地小鬼湖的入口，群山環繞，故有「雲端上的部落」之名。部落人口數 80 餘戶、約 300 餘人，是魯凱族族花百合花的發源地，在莫拉克風災發生之前未曾遷移過。部落分為上、下兩個聚落，在風災中衝擊程度不一。上聚落稱 Baliu，該處家屋絕大多數保持完好，居民原先不願遷離祖居地；下聚落稱 Wmawma，則因地層滑動無法再居住，居民亟需政府協助取得永久屋。但當年劃定「安全堪虞」特定區的勘查行政作業相當粗暴，不顧兩個聚落受損情況之差異，將全區一概劃為不適居住的特定區，並以入住永久屋為條件，要求居民先同意放棄原鄉家屋的居住權利。如此一來，迫切需要安置的下聚落居民與不願遷離家園的上聚落居民之間也出現矛盾與裂痕。由於阿禮部落一向以高度團結著稱，族人也以此自豪，這樣的分裂危機刺痛了每一位族人的內心。最終上聚落居民在「只有一個阿禮」(wakari edin) 的認知和籲求之下，願意放棄家園隨同下聚落居民一同遷至長治百合園區(園內尚有吉露、谷川、佳暮、達來、德文等共六個部落一同進駐)共計 76 戶入住；但仍有 4 戶留守原鄉家園，不願搬遷。

### 2. 吉露 / Kinulane

吉露部落位於屏東縣霧臺鄉，地理位置於隘寮北溪中游右岸、臺 24 號道路下方，坐落於井步山東北方的峻嶺傾斜陡坡地，海拔高度約 1000 公尺，是霧臺鄉各部落行政區中面積最小且戶口數最少的部落。居民以魯凱族為主要族群。

2009 年風災重創，部落三分之一的面積被土石流沖走，部落地基嚴重滑落，後經內政部劃定為不安全地區，因此全村被迫遷離家園。風災發生初期、部落被迫強制遷離至平地時，政府沒有足夠的安置空間，吉露居民多選擇依親，只有極少族人選擇至政府的臨時安置所。吉露散居依親的情形，導致後來政府與社福團體設立安置空間之時，出現規劃不足以及部落難以集體商議決策的情形。風災前吉露部落原共有 82 戶，但長治百合園區內僅有 38 戶。十餘年來，為了讓整個部落可以集體居住在一起，其餘四散在各地的部落族人積極申請於長治百合永久屋基地自力建屋，期待早日族人得以團聚。

### 3. 來義 / Tjalja'avus

Tjalja'avus 中文稱為來義，排灣族為其最主要族群，地理位置於屏東縣境的來義鄉。族人歷經兩次遷移，第一次是在 1950 年代為了配合集團移住政策，遷

往 Tjanadjaqas (來義村東部落)、Vuta (來義西部落)、Tjuavaljiv (義林村)、Siljevavaw (丹林村喜樂發發吾) 等地。第二次則是在莫拉克風災後，部分族人遷居至新來義永久屋，為非遷村型永久屋聚落。目前設籍於來義村的住戶約 346 戶，人口約 1,108 人。莫拉克風災時有 113 戶遭殃，以及隔年 919 風災時，來義國小和約 52 棟民宅受損，這也使得受害族人們被迫搬遷至台糖的新埤鄉萬隆段用地南岸農場之新來義永久屋。絕大多數居民都來自於 Tjalja'avus (來義舊社)，因此永久屋園區取名為「新來義部落」。至此之後，來義部落形成兩大居住區域：來義村與新來義永久屋，唯新舊區域距離非如另前兩個場域之遙遠，故來往仍頻。

### 三、問題意識：遷村部落的文化復振焦慮與自信

莫拉克風災過後不久，學界與原住民團體對於政府安置政策的初步評估是相當悲觀而負面的，當年原本標舉「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重建原則，短短不到二十天卻改變方向，確定「一次到位」的重建方向，略過中繼階段，直接選擇以永久屋為主的安置政策(謝志誠、陳竹上、林萬億，2013: 50)。原住民部落族人與社運團體很快發出警告，人與土地分離會帶來「滅族」的後果，因為原鄉所在的部落，是維繫社會組織與凝聚、傳統生計生態模式、文化傳承與延續的必要條件。台邦·撒沙勒(2012)也以好茶部落數次遷村為例指出，對原住民部落帶來真正打擊的不是自然災害(hazard)，反而是不當政策介入製造出的社會脆弱性，這讓災難(disaster)更加嚴重，也更難承受。因為災難而造成的永久遷移將對工作、家庭乃至部落認同產生巨大衝擊，被迫離家的災民們飽受心理高壓與文化疏離的創傷；災後遭到永久安置的原民不僅面對全新的生活環境，個體和家屋間的依附、歸屬和認同遭受巨變，從而影響到個人和部落之生存意志(謝文中、鄭夙芬、鄭期緯，2011)。然而，十二年過去，即便在極端不利的條件下，在滅村的悲觀預測中，這些原住民部落仍然展現了「社會韌性」(social resilience)。這也顯示了另一派研究的論旨，「遷移與文化的失落並沒有必然的關連」(蔣斌，2010: 27)，因為文化是實踐的、創造的。長久以來原住民族在變遷的環境中，就透過各式各樣的實踐，不斷創造與祖居地之間新的心靈聯繫。另一方面，對「新家」的認同並不代表放棄對「原鄉」的依戀。於是，屏東境內原住民部落以身實踐，成為「災難與復原」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社會場域。本計畫之目的，並非試圖論斷哪一種學理預測的適用，屏東原民遷村部落也沒有任何一案例完全滿足單一模式。現實中我們觀察到這些遷村部落，心懷原鄉卻未

必僅限於原鄉，人在他鄉卻未必從此身在異鄉，在「返回原鄉」或「認同園區」兩種復原策略選擇中，我們看到各個部落都在努力進行不同的文化傳承與深耕策略。我們選定阿禮、吉露與來義部落這三個自然條件、社會結構、遷村過程均有不同的部落，希望更為理解這些差異性某種程度造成各部落發展出不同的文化傳承的模式以及部落認同——包括如何連結「原鄉」與「園區」的創新策略。

#### 四、場域實踐策略：與時間賽跑的文化復振

本計畫團隊視三個部落的需求，與部落內不同組織（傳統領袖／部落會議、鄉公所／村辦、教會、文化健康站、社區發展協會、青年會……等）進行對話與合作，試圖釐清各部落目前對於自身文化復振之需求以及行動方案的想像；計畫團隊也透過陪伴與協助，讓部落的重建與創新的努力得以往前推進。這些在地努力與實踐策略可分為以下幾項：

##### （一）擴大青年的公共參與

移住之後，其實讓原本離鄉的青壯年人口離部落更近，反而創造出一種更容易返鄉的互動狀態。但是因為部落離開故土，原有的日常經濟行為（耕作）及歲時祭儀被迫中斷，如何讓忙於生計的青壯年人口，以及在永久園區長大的青少年增加部落認同及擴大公共參與，是部落新的議題。在阿禮、吉露及來義都出現這樣的挑戰，部落整體必須能夠創造出積極的環境及有效策略，讓青年認識、並且承擔起文化傳承。又因為遠離故鄉，年長者逐漸凋零，對於部落領袖以及積極行動者來說，出現了跟時間賽跑的一種潛在緊張與使命感。

##### （二）文化的整理與傳承

在前述的緊張與驅力下，三個部落逐漸整理出幾個行動模式：例如（1）古謠記錄與傳唱：讓老人家說明並且教唱，青年透過記錄來學習，並且在適合的場合（傳統祭儀或者新辦歌謠活動）進行發表；（2）祭典重建與傳承習作：讓青年團隊嘗試規劃祭典活動，年長的部落幹部扮演導師的角色（圖一）；在祭典前規劃青銀共學的文化培力系列活動。這樣的經驗傳承不是靠著記憶與背誦，而是必須透過綿密的日常實作才能做到。最後，對於長者的知識蒐集及記憶動員，成為計畫中很重要的工作，因此例如：老照片展、傳統領域定界訪談、古謠解說、資料（舊錄影帶、錄音帶、文案）解密，都是在場域中的重要行動策略。



圖一：跨世代共同籌辦阿禮收穫祭（本計畫提供）

### （三）尋根溯源：故鄉與他鄉的對話

文化如果不是靠背誦記憶而成，就必須要更積極的將歷史、地理以及身體實踐三者合一。計畫中的三個部落，都發展出不一樣的返回原鄉原居地的尋根活動。吉露部落定期舉辦青年返回舊吉露的行動，雖被判定為不適合居住區域，但是與原居地的指認與連結，對於青年來說，是維繫認同的重要的策略。吉露部落另外發展出一項重要的行動，就是在園區「重建芋頭窯」，讓長者與青年藉此進行農耕、儲存、石板建築等文化與知識傳遞（圖二）。阿禮族人仍保有一定的返鄉活動，同時透過部落觀光之推展也能活絡族人的文化使命。近來阿禮傳統領袖與部落發展協會擬將山上古道的調查、石板維護、與文化意義進行梳理（圖三），試圖藉由整理古道來強化「雙故鄉」的概念，連結山上與山下，讓部落之集體傳統得以延續。來義部落則是透過族人網絡動員與行政單位協助，對於 1950 年代以前的舊居地進行探訪、清掃與指認，將在今年秋天收穫祭之時，結合舉辦遷村七十週年的返鄉活動（圖四）。

### （四）園區中的人權、文化與生計

對於遷村部落的日常來說，最實際的仍是居住權、文化權與工作權的保障。本計畫在 2022 年邀集了各永久屋區代表，辦理了「原地流亡：莫拉克災後原住民族人權工作」，探討目前各部落在住居與園區所遇到的政策與法令問題。同時於 2023 年 6 月舉辦「災難復興國際論壇」，邀請日本、印尼與美國學者討論自然災難與社區復振的國際經驗比較（圖五）。



圖二：吉露跨世代族人合作，在永久屋園區蓋起夢想中的芋頭窯(本計畫提供)



圖三：步道之設置與修護是部落文化傳承重要一環(林芸姿攝影)



圖四：來義舊址踏查(本計畫提供)



圖五：災難復振國際論壇：日本京都大學落合教授說明日本傳統防災知識（本計畫提供）

另外，在園區的硬體規劃，如缺乏耕地、公共空間、屋舍增建改建、以及集體自立造屋等議題，也都是部落遷進永久屋園區之後要處理的問題。外界很難想像，在所有權與繼承權不明、園區面積有限、返鄉之路又遭到阻撓等狀態下，部落所面臨的壓力。

為了不讓文化傳承中斷、族人各謀生計、最終部落四散成為事實，在園區生活圈相關的文化、家族、教育、長照、產業發展，都必須要結合起來思考。這兩年來，計畫團隊隨著部落的需求，共同努力於家族族譜溯源、文健站長者訪談（圖六）、工藝與農產市集、靈媒文化復振、花材與小米耕作、傳統防災知識採集等，期使三個部落可以兼顧文化知識傳承與社區經濟利基。



圖六：來義文健站長者正為古謠釋意（鄭百騰攝影）

## 五、結語：大學研究與部落實踐的相遇

本計畫主持人為陳永森校長，團隊共有七名跨域教師，包含共同主持人邱毓斌、夏傳位（社會發展學系）、李馨慈、林慧年（原住民專班）、古淑薰（文創系），以及屏大校務基金為本計畫專聘的黃雅鴻、吳明季專案助理教授；另聘有六位專任助理。感謝國科會的支持，計畫執行迄今發現，部落靠著自己的韌性與力量，在當年政府未顧及「人與土地」緊密文化聯繫的重建政策中，逐漸摸索出一條復甦的道路，社會團結的力量甚至讓錯誤政策也產生非預期的正面結果。他們如楊達所說「壓不扁的玫瑰」，在水泥地的罅隙中開出燦爛的花朵。不過，旺盛生命韌性卻也是根植在朝不保夕的基礎之上，這正是本計畫得以介入之處：在這個原民部落在故鄉／他鄉之間碎裂與重建的過程中，在地大學的研究與社會實踐力量能與部落各種組織進行協力合作，透過創新實踐以及積極培力來解決困難，同時為災難而遷村的原民部落之文化傳承與再生過程整理出新的知識成果。

## 參考文獻

- 台邦·撒沙勒(2012)。<〈災難、遷村與社會脆弱性：古茶波安的例子〉，《臺灣人類學刊》10卷1期，頁51-92。
- 蔣斌(2010)。<〈災難、文化與「主體性」：莫拉克風災後的省思〉，《思想》14期，頁19-32。
- 謝文中、鄭夙芬、鄭期緯(2011)。<〈這是「房子」，不是「家屋」：從解釋性互動論探討莫拉克風災後原住民的遷徙與衝擊〉，《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4期，頁135-166。